

#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

# 导读

本书为国内第一部全面译介当代国外翻译理论流派代表性论文的译作选集，共选择了国外当代最前沿、最有权威性的八大主要理论流派的三十三名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论文三十三篇，全部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并为每一流派、每篇论文配上简明扼要的导读性文字，使读者能迅速了解并掌握该流派或该论文的学术背景、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本书既可以作为各外语院系翻译专业(方向)研究生翻译理论课的教学材料，也可作为本科高年级相应课程的教学辅导参考书。对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学者、教师，以及广大对翻译理论、国外文论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也是一本极有价值的案头必备读物。

谢天振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 谢天振主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310-02830-6

I. 当… II. 谢… III. 翻译理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420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9.375 印张 2 插页 561 千字

定价: 40.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 前 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在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各地报考外语院系研究生的考生中，差不多有一半考生选择的志愿是“翻译”，即使在入学以后，也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研究生希望学习翻译专业。与此相应，国内出版社在近二三十年里出版的翻译教材、翻译研究著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也都堪称空前。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南北两家外语大学的出版社，分别引进了数十种当代国外最新的翻译理论英文原著，为国内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教师和研究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外文资料。

不过问题也由此而来：面对数量众多、流派纷呈、内容丰富但又比较复杂的国外引进原版译学论著，不少读者、尤其是初登译学殿堂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翻译专业的研究生（遑论其中非英语专业的其他外语语种的研究生），确实有一种目迷五色、无所适从的感觉。由此我们萌发了编写一本中文版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的入门性读物兼教材的想法，以帮助对当代国外译学理论流派及其代表性论著感兴趣的读者，尤其是广大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在短时间内即可较快地把握当代国外翻译理论的概貌，并且可以比较迅速地从中发现自己的专业兴趣和研究方向所在，从而再去寻找合适的相关译学专著进行深入的阅读。为此，我们在对当代国外翻译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和研究之后，确定从中择取八个主要的理论流派（语言学派、阐释

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译论、苏东学派),然后在每一个流派里面找出几个最主要的代表性学者(共33名)及其代表性论文(共33篇),把它们全部翻译成中文,并在每一章(即每一流派)、每一篇论文前都配上一篇简明扼要的导读性文字,以便读者能比较快地对该流派或该论文的学术背景、基本框架和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此,本书既可以作为各外语院系翻译专业开设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翻译理论课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应课程的教学辅导参考书。对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教师,以及广大对翻译理论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也是一本很有裨益的案头必备书。

国外的翻译研究,在西方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贺拉斯等人的相关著述。然而在这漫长的两千余年的时间里,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除个别学者如德国的洪堡、本雅明外,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始终没有跳出“怎么译”这三个字。也就是说,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西方的翻译研究者所关注的一直就是“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以散文译诗”还是“以诗译诗”这样一些与翻译行为直接有关的具体问题,他们的立论则多出自论者自身翻译实践的经验体会。

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一批从语言学立场出发研究翻译的学者,这就是目前国内译界都已经比较熟悉的尤金·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人,他们的主要译学著作也已于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译介到中国来了。这批学者被学界称作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我则把他们的研究取向称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意思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跳出了经验层面,他们从语言学立场出发,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从而揭开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层面(详情请参阅本书第一章相关内容)。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译学界又出现了另一批目前我国国内翻译界还不很熟悉的学者,我把他们统称为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这批学者接二连三地召开翻译研讨会,并推出多本会议论文集,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

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霍氏的这篇论文于 1972 年作为主题发言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首次宣读。这篇论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它的清晰的翻译学的学科意识。该文明确提出用 *translation studies* 一词、而不是 *translatology* 这样的陈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名称。这个提议已经被西方学界所普遍接受，并广泛沿用。国内曾有个别学者望文生义，以为霍氏不用 *translatology* 一词就说明国外学者并不赞同“翻译学”这一概念，实乃大谬不然。其实在该文中霍氏已经详细地说明了他为何不选用 *translatology* 及其他如 *the translation theory* 或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等术语的原因——为了更好地揭示和涵盖学科的内容（请参阅本书第四章相关内容）。当然，对中国读者来说，有必要提醒的是，当我们看到 *translation studies* 一词时，应根据具体上下文确定其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还是指某一个学科。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在文中霍氏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ThT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三大块研究领域。

继霍氏之后，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及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以他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对翻译

研究文化学派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他接过霍氏有关描述研究的话语，指出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一种是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另一种是规范性研究（prescriptive research），而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就属于前者。这样，他就把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明确区分开来。1976年，他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一文中更是具体分析了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文学的关系，并提出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体系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的三种条件，在学界影响深远。

另一位学者、佐哈的同事图里（Gideon Toury）把霍氏勾画的翻译学学科范畴图作了一番调整并重新进行划分，使得翻译学的学科范畴、研究分支更加清晰。图里还提出，任何翻译研究应该从翻译文本本身这一可观测到的事实出发，而翻译文本仅仅是译入语系统中的事实，与源语系统基本无涉。这里图里与佐哈一样，实际上是进一步强调了DTS的基本立场，从而与此前以过程为基础、以应用为导向的翻译研究形成了本质的区别。佐哈与图里也被人称为翻译研究的特拉维夫学派，因为他们两人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任教。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与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或各自著书撰文，或携手合作，为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勒菲弗尔同样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但他对以色列学者未曾充分阐释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提出“折射”与“改写”理论，认为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一样，是对原作的一种“折射”（reflection），翻译总是对原作的一种“改写”或“重写”（rewriting）。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他更是强调了“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人”（patronage）、“诗学”或称“文学观念”（poetics）三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操纵（manipulation）。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以及他的三因素论成为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柱，以他为代表的文化学派也因此还被称为“操纵学派”或“操控学

派”。

巴斯奈特是西方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的坚定倡导者，她的专著《翻译研究》于1980年推出第一版后，又于1991年和2002年先后推出第二版和第三版，对西方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起到了及时总结、积极引导的作用。她从宏观的角度勾勒出了翻译学的四大研究领域：译学史、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翻译与语言学研究以及翻译与诗学研究。她在20世纪9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中更是明确阐述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相遇的必然性。她指出，两个领域的研究都质疑学科边界，都开创了自己新的空间，关注的主要问题都是权力关系和文本生产，而且都认识到理解文本生产的操纵过程的重要性，因此两个学科的学者可以在很多领域进行更富有成果的合作。

巴斯奈特的话非常确切地点明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全面向文化转向，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成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

譬如借用了解构主义的理论。研究者认识到，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通过撒播、印迹、错位、偏离，原作语言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原作的生命才得以不断再生。

再譬如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应用，不仅张扬了女性译者的主体意识，还直接影响到女性译者的翻译策略：她们借助补充（supplementing）、前言与加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ghjacking）等策略，赋予译本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至于其他一些文化理论，如当代阐释学理论、后殖民理论、功能论等，也都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从而赋予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以新的面貌。

最后，有必要一提的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最近二三十年来，一批从语言学立场出发研究翻译的学者，像哈蒂姆（Basil Hatim）、梅森（Ian Mason）、豪斯（Julian House）、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莫娜·贝克（Mona Baker）

等，也正在尝试借鉴语言学的特定分支或特定的语言理论，如批评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法、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将非语言因素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创建关于翻译的描写、评估或教学的模式，在探讨翻译语篇问题的同时也揭示世界观、意识形态或权力运作对翻译过程和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透露出向文化转向的迹象和特征。他们不再像以往的语言学派学者那样把翻译仅仅看成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同样意识到翻译是体现和推动社会的力量。在他们的理论框架和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语言学以及翻译的语言学派对语言和社会关系的新认识。这些迹象表明，也许在当前西方的翻译研究界正在形成一支有别于以奈达等为代表的老一代语言学派的新一代语言学派，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第二代语言学派”。当然，目前这还仅仅是我个人一个很不成熟的假设，我很希望对此现象感兴趣的专家学者对之能作进一步的科学论证，这对我们国内译学界全面深入认识西方翻译中的语言学派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国外译学界发生的这两个“转向”，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转向”，与我们已经习惯和熟悉的立足于经验层面的翻译研究传统显然大异其趣，因此必然会对我们国内译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全面把握当前国外翻译研究的最新理论走向，正确、理智地应对当前国外翻译研究所发生的一些最新变化，恐怕是我们每个从事翻译研究和教学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每个选修、研习当代国外翻译理论课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都应该予以认真、严肃思考的问题。这里我想提出三点个人的想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我觉得我们在研究当代国外翻译理论时，首先要转变一下在我国翻译界一个比较根深蒂固的观念。众所周知，在我国翻译界有相当一部分翻译家，也包括一部分翻译研究者，他们总认为当代国外的一些翻译理论，包括借鉴自各种文化理论的翻译理论，诸如解构理论、性别理论、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它们属于西方，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它们只能解决西方翻译中的问题，不能解决中国翻译中的问题。更有甚者，他们不去对西方的翻



译理论作一番认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仅凭着自己的主观印象，就轻率断言，“西方译论只能解决低层次的科技翻译问题”，只有“中国译论才能解决高层次的文学翻译问题”，等等。

这种把理论简单地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做法，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的北京大学严绍盪教授所说的一番话。他说：“我们以前一直以为现代化是属于西方的，于是搞现代化就意味着搞西化。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现代化并不只属于西方，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对了。是啊，现代化的确并不只属于西方。人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必然会进入到现代化阶段，从茹毛饮血到食用熟食，从学会用火到学会用电、用天然气、用核电，等等，人类迟早都要进入这个阶段，只不过是时间的先后而已。

如果说，自然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物质条件等方面的改变的话，那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思维方式、认知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改变了。我在这里不需要举马克思主义的例子，因为我想没有人会以为马克思主义只属于西方，尽管这个理论是一位西方人提出来的。我就举操控学派的翻译理论为例，这个理论提出了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特定民族的文学观念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翻译中的这些关系，难道仅仅是属于西方的吗？操控学派对这些关系的研究和分析，难道对我们没有借鉴意义吗？而国内译学界之所以有人对西方译论持拒斥态度，我觉得，这些人恐怕是把理论的发明权与某一理论所阐明的规律、所提供的认识事物的角度、研究方法等之间的关系混淆了。理论的发明权是有明确的归属的，但理论所提供的认识事物的角度、方法等，却并不局限于发明者本人所属的民族或地域。我想我们大家一定会同意这个结论：人类的先进文化并不只为某一方（西方或东方）所特有，它属于全人类。同样，先进的、科学的译学理论，它们是相通的，也并不为某一方所特有。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理论、思想从某个特定民族的语言的“牢笼”下解放出来，让这些理论、思想归全人类所有。而我们某些从事翻译教学、翻译研究的同行们，反而要把这些已经“解放”出来的理论、思想，贴上“西方”的标签，然后

坚决拒之门外，这不是很奇怪吗？

第二，我觉得我们还要改变一种思维方式。在我国翻译界有一种非此即彼，把不同译学理论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和西方的译学理论是对立的，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是对立的，规范学派与描述学派是对立的，甚至认为从事翻译实践、从事翻译教学的人与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也是对立的。事实其实并非如此。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理论，只是所要寻求解决的问题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研究的层面和领域（范围）不一样。但它们研究的对象——翻译——是一样的，探讨的问题更是不乏相通之处。语言学派更多关注的是语言层面上的事，关注文本以内的问题，它回答不了文艺学派关注的问题。但同样，文艺学派也解决不了语言学派提出的问题。规范学派关心的是“怎么译”，而描述学派则要回答“为什么这么译”。这里不存在一个流派或学派颠覆另一个流派或学派的问题。它们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

当代国外（主要是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层面上去分析翻译现象，而并不关心如何翻译的问题。这与中国翻译界的现状相差很远，中国翻译界一直非常关心如何翻译、如何提高翻译的质量问题。于是，中国翻译界就有人以为西方的翻译理论没有用。其实，这是各人思考问题的层面、研究目标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它们彼此并不矛盾，也不对立。国内曾有学者担忧，引进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后，我们是不是翻译时就不要讲“忠实”了，还有学者撰文称解构译论把我国译论中的“化境论”“消解”掉了，等等。这些看法其实都是对当代西方译论的误解。

第三，我觉得我们要跟上当前国际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就要努力关注国外学术界的前沿理论，同时积极、主动地调整我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大多是外语专业出身。按理说，多掌握一门外语，就等于多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多一份直接接触国外第一手材料的能力，我们的视野应该比其他学科的人更加开阔才是。但是，事实上，与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的人相比，我们在知识面、在理论修养、在逻辑思维等方面，反而不如人家。这其中

的原因，我觉得也许是跟我们的教学体制、教学的指导思想有关吧。我们的外语院系多把掌握外语作为最终目标，而不是把外语作为一种研究或从事某项工作的手段。这与国外、海外大学里的外语系不一样，与我们国家 1949 年以前大学（如北京的清华、上海的圣约翰等）的外语系也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外语系，就是学习外语，如果说有理论的话，那就是很少的一点语言学理论，而在知识面方面，也就是相当肤浅的一点相关语种的国家的文学史知识而已。

前不久曾听说有人在一次翻译研讨会上批评说，现在一些搞翻译理论的人的本事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文章写得人家看不懂。此话一出，还博得一阵颇为热烈的掌声。其实，这话是似是而非、既对又不对的。说它对，是因为目前我们国内是有一些作者在写文章时，自己还没有弄懂相关理论的意思，便生搬硬套，甚至故意卖弄一些外来的理论术语。这样的文章是有问题，读者是看不懂。但这话又有不对的一面，因为它只看到作者一方的问题，却没有看到读者一方的问题。因为通常理论文章都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一些专门的、甚至不无偏涩的理论术语，譬如我们前面提到解构理论时提到了“撒播”、“印迹”、“错位”、“偏离”等术语，如果读者不具备基本的理论修养，对这些术语不了解，他（她）如何能读懂德里达的文章呢？就如一位读者，他（她）如果都不知道“能指”、“所指”，只知道“手指”，那他（她）能读懂索绪尔的语言学论文吗？可见，看不懂理论文章的责任并不只是在作者一方，有时读者一方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反对那些故弄玄虚、生搬硬套外国理论的文章，但另一方面也要正视自身的不足，不要作茧自缚，自满自足，自以为是，而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努力关注前沿理论，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防止已有知识的老化、僵化、教条化，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适应时代的需要。

最后，交待一下本书的分工情况。本书由谢天振教授负责制定全书的框架结构、确定选文、组织译者翻译，并负责全书的最后校译和统稿。全书的“前言”和各章的“导言”作者分别为：

谢天振：前言，第八章“导言”；  
江帆：第一章、第四章“导言”；  
刘霁：第二章、第三章“导言”；  
陈浪：第五章“导言”；  
卢玉玲：第六章、第七章“导言”。

每篇译文前的“导言”由译者本人负责撰写，由主编最后定稿。译者姓名见每篇译文的首页，在此不再一一列出。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在导读文字的编写，尤其是在论文的翻译方面，肯定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诚恳希望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我们将在有机会再版时认真吸取各方意见，及时加以修正。

谢天振

2007年9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 目 录

## 前言

<b>第一章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b> .....	1
1. 罗曼·雅科布逊	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4
2. 彼得·纽马克	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II).....14
3. 约翰·卡特福德	论翻译转换.....25
4. 尤金·奈达	论对等原则.....36
5. 巴兹尔·哈蒂姆	互文介入:利用翻译中缺省 语篇的理论体系.....60
6. 玛丽·斯奈尔-霍恩比	翻译:一种跨文化活动.....82
<b>第二章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b> .....	101
7. 乔治·斯坦纳	阐释的步骤.....104
8. 安托瓦纳·贝尔曼	翻译及对异的考验.....113
<b>第三章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b> .....	135
9. 凯瑟琳娜·莱斯	翻译的抉择:类型、体裁及 文本的个性.....139
10. 汉斯·弗米尔	翻译行为中的目的与委任.....157
11. 克里斯汀娜·诺德	目的、忠诚及翻译中的惯例.....175

<b>第四章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b> .....	197
12. 詹姆斯·霍尔姆斯	翻译学的名与实 .....
13. 伊塔玛·埃文-佐哈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 .....
14. 吉迪恩·图里	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15. 安德烈·勒菲弗尔	大胆妈妈的黄瓜：文学理论中的文本、系统和折射 .....
16. 苏珊·巴斯奈特	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
17. 西奥·赫曼斯	翻译研究及其新范式 .....
<b>第五章 解构学派翻译理论</b> .....	315
18. 瓦尔特·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 .....
19. 雅克·德里达	巴别塔之旅 .....
20. 保罗·德曼	评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 .....
21. 劳伦斯·韦努蒂	文化身份的塑造 .....
<b>第六章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b> .....	385
22. 雪莉·西蒙	翻译理论中的性别化立场 .....
23. 劳丽·钱伯伦	性别与翻译的隐喻 .....
24. 巴巴拉·格达德	女性主义话语 / 翻译的理论化 .....
25. 冯·弗罗托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批评 .....
<b>第七章 后殖民翻译理论</b> .....	455
26. 道格拉斯·罗宾逊	后殖民研究与翻译研究 .....
27. 特佳斯维妮·尼南贾纳	翻译的定位 .....
28. 盖亚特里·斯皮瓦克	翻译的政治 .....
29. 埃尔斯·维埃拉	解放卡利班们 ——论食人说与哈罗德·德·坎波斯的超越 / 越界性创造 诗学 .....

<b>第八章 苏东学派翻译理论</b> .....	553
30. 安德烈·费奥多罗夫 翻译理论的任务.....	557
31. 吉维·加切奇拉泽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原则.....	564
32. 吉里·列维 翻译是一个作选择的过程.....	575
33. 安娜·丽洛娃 翻译研究的范畴.....	595

# 第一章

##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奥古斯丁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提出了语言符号的“能指”、“所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开创了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传统。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普通语言学理论，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也为当代翻译研究的各种语言学方法奠定了基础。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路线从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始，一直延伸到21世纪。沿这一路线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方法，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语言为核心，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出发研究翻译的对等问题。

20世纪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得到巨大发展的时期。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翻译学者开始从科学的、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讨论翻译问题，他们运用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等现代语言学理论，对翻译问题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开拓出翻译研究的崭新领域。他们的研究深入到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通过微观分析来考察一系列语言层次的对等，较为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严格说来，正是这些研究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理论层面。翻译研究的这一语言学转向是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次质的突破和飞跃，以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初，翻译甚至被纳入语言学范畴，被当作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语义学的一个分支。

一般认为，西方语言学派开始对翻译进行“科学”研究的标志是



美国著名学者尤金·奈达 (Eugene Nida) 于 1947 年发表的《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 *Bible Translation: 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boriginal Languages* )。语言学派在地域上分布较广, 其代表人物主要集中于英美, 代表人物有奈达、卡特福德 (J. C. Catford)、纽马克 (Peter Newmark)、哈蒂姆 (Hatim) 等。除此之外, 捷克布拉格学派的雅科布逊 (Roman Jakobson), 前苏联的费奥多罗夫, 法国的乔治·穆南 (Georges Mounin), 以及德国的斯奈尔—霍恩比 (Snell-Hornby), 也都是当代国外语言学派的突出代表人物。

雅科布逊于 1959 年发表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 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中存在的一般问题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 为当代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理论方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被奉为翻译研究经典之作。在这篇论文中, 雅科布逊首次将翻译分为三类: 语内翻译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和符际翻译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这一分类方式准确概括了翻译的本质, 在译学界影响深远。

尤金·奈达则是语言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著述极丰, 其理论对西方当代翻译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提出了“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 是“翻译科学说”的倡导者; 他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 把信息论应用于翻译研究, 认为翻译即交际, 创立了翻译研究的交际学派; 他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原则, 并进而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提出“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 他还就翻译过程提出“分析”、“转换”、“重组”和“检验”的四步模式。这些观点都在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然而, 由于尤金·奈达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圣经》翻译基础之上的, 所以, 他提出的动态对等原则乃至功能对等原则都过于注重内容而忽视形式, 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 语言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学者纽马克提出了不同意见。纽马克主要从事德英互译理论和实践的教学, 在许多翻译理论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 他提出了“交